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史教研室外国教育史组

【选编】

外国教育发展史料选粹

【主编】夏之莲

WAI GUO JIAO YU FA ZHAN SHI LIAO XUAN CUI

①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外国教育发展史料选粹

(上 册)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史

教研室外国教育史组选编

夏之莲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教育发展史料选粹/夏之莲主编.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重印

ISBN 7-303-04936-3

I. 外… I. 夏… ~~I. 教育史-史料-世界~~ N. G5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 9737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出版人:常汝吉

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mm×1 168mm 1/32 印张:45.375 字数:1 138 千字

1999 年 5 月第 2 版 200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 001~3 000 定价:55.00 元(全二册)

前 言

《外国教育发展史料选粹》一书，是在中央教育科学规划“七五”重点科研项目《世界教育史教学与科研参考资料选编》的文字成果上编纂而成的。

1987年，应国内高等师范院校“外国教育史”学科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上，我们申请并被批准了上述科研项目，目的在于为本学科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本学科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从原始史料上提供一定的参考需用资料。

“外国教育史”学科是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的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必需有坚实的教材。在旧中国，这门学科的教材主要使用从欧、美以及日本等国家移译过来的教本；解放以后，最初的十年左右，又主要使用从原苏联移译过来的数种教本；直到60年代初，在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以后，在我国才开始有少数国人自编的“外国教育史”教材。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基于各学科发展水平和国内高教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编写各学科新教材的工作突飞猛进，“外国教育史”教材的编著也在这一形势下取得重大发展，涌现出不少优秀教材课本。截止到80年代末，国内正式出版的“外国教育史”教材已有十数种不同形式的版本，大大地改进和丰富了本学科的课堂教学用书。

但是，作为一门历史学科，其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与保证，固然教材是最重要的基础之一，但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使我们也深刻认识到，要更加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除教材内容、教学方

法的不断改革与发展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这就是必须要有一套丰富、翔实、确凿、系统的原始史料和重要资料为教科书的讲授提供科学的史据和切实的佐证，以便通过原始史料生动地表明一部教育发展史的实际进程，了解前人是怎样通过艰苦的教育实践和理论论证推动教育活动如何不断向纵深发展、曲折前进的，从而揭示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给后人以继续推动教育发展的多种启迪。这就需要编选一部系统的史料选集，使它与教材课本在教学上并驾齐驱使用。这是因为，无论一种多么优秀的教材，具有多么丰富的内容和精当的理论分析，但由于受教学计划在教学时数、教学大纲上的限制，其容量总是有限的：教育史发展中大量鲜活的史实、重要的历史文献，特别是历史上对重大教育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所留下的丰硕的优秀成果，都不可能完全收入教本之中。而被拒留于教本之外的史料与资料，又恰恰是丰富学生知识、开启其史论视野、形成其科学教育史观的重要依据。因此，史料文集的编选，在提高本学科教学质量上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对推动本学科的继续发展所急需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更需要有比较集中的史料作为参考。

然而，前面已提到，在我国解放前后虽已积有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多种教材读本以及有关著作，但却还没有一本综合性的、系统全面的外国教育发展的史料选集。196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曾出版了《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一书，并于1979年再版，它对国内本学科的教学与科学研究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但它却是一本单一选录近代资产阶级教育论著的选集，不包括教育制度与教育实践方面的历史资料。1991年由华中师大、西南师大等四所兄弟师范院校编译出版了由美国教育家E. P. 克伯雷 (Ellwood P. Cubberley 1868~1941) 于1920年选著出版的、译名《外国教育史料》一书，它也是供国人阅读的重要的外国教育史料文集。但该书的原著者在其“序言”中明确指出，这是一本用以“说明教

育实践、教育进展和教育制度的历史,而不是说明教育理论的发展史”(见《外国教育史料》第1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的史料书,也就是说,该书在教育理论方面的史料选的较少,且其所选史料只截止到本世纪的最初年代,而在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特别是50年代以来外国教育的大发展、大改革,直到七八十年代各国及世界性教育发展的多姿多彩的史料都未及选入。因此,我们在前人的启示与影响下,依据我们自己所具有的一些条件,下决心通过科学研究的过程,来编选一部兼顾教育制度发展、教育思想发展,以及千百年来世界范围内有关外国教育史学科进行科学研究所取得的优秀成果的原始史料集,以应前面所述的需要。

我们所具有的条件其重要者有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依据当前多种教材版本的教学需要,特别是我们自己出版了《外国教育史(上、下册)》(1984、1985年北京师大出版社出版。1993年末该书又重订出版)的系统教材,对教材在教学中需要原始史料和重要资料给以配合、补充以提高教学质量的诸多要求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第二,在我们近半个世纪几代教师的教学实践中,围绕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需要,先后从多方面搜集、掌握并涉猎过相当数量的史料、文献和具有重要价值的资料选录等等。不过它们都还是散在的,不系统的,但它们具有通过科学研究使其更加精确、充实,并加以系统编排、确当解说的基础;

第三,我们有一支专门从事外教史学科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队伍,可以胜任且愿意承担这项史料编选的科研任务。

具有这些基础和条件,在1987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上,我们申报了前述《资料选编》的课题,经会议批准并被确定为重点项目。

课题组在几年的研究编选过程中,除对已有中译的大量原始

史料进行研讨、编辑、筛选外，又用一定的力量新译了一些外文史料与资料。课题完稿后，由中央教育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国内知名教育史专家如：滕大春、赵祥麟、任钟印、黄学溥和王炳照诸先生鉴定通过，最后由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批准。现在易名《外国教育发展史料选粹》（以下简称《史料选粹》，或《选粹》）作为史料文集由北师大出版社出版。

《史料选粹》的基本内容，包括古代、近代、现代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制度发展史料、古今重要教育思想和言论精华，以及各历史时期有关外国教育史学科的优秀科研成果等。

关于教育制度方面的史料涉及到各国教育体制的形成与发展，各种学校及其制度的产生与演进，教育内容和课程体系的确立与变化，诸种教学方法的创建、改进与继承，教育组织形式的发展，和有关现代教育所重视的教育管理、教育评价等等重要史料，都依时间顺序及各国教育历史的沿革进行了编选。此外，《史料选粹》还对外国教育史上有关教育立法的史料给以较大的关注，做了较系统的选编。

关于教育理论发展的史料，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历史上各个时期相继出现的各国、各家、各种教育理论的巨著、名著，这在我国解放前后都有多种汉译本出版，特别是在 80 年代至 90 年代末近 20 年间，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翻译、编辑、出版了四五十部世界著名教育家的教育理论、教育思想著作，极大地满足了我国教育界对学习、研究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珍贵教育理论遗产的需要。因此，在我们这本《史料选粹》中，凡已正式出版过的教育著作，除少数外，基本不再选入。但长期来我们搜集并掌握有一部分教育家们在其大部头著作之外遗留下来的其他教育思想、言论、教育短论的名篇等，经过研讨，我们把它编入了《选粹》。这些理论性著作的史料，不仅其本身在推动外国教育史发展中具有重大的影响与作用，而且它们也足以作为已出版的教育巨著的补充，切合

当前教学与科研的需要。

至于教育史上不同时期在个别国家内部或世界范围内出现的重大教育运动或思潮，其产生、实践与对它们的有关评论，不同时期出现的教育观点、理论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辩驳，前后继承与发展的文章，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以来，现代教育观念、教育理论流派、教学论新体系等多方面、多角度的涌现，《选粹》也对它们作了一定的精选，以便使这些史料能够得到相对集中与系统的选编。这些史料大多属于历史上有关本学科的科研成果，选取它们既能从多方面了解一部教育史发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更能启发今人在推动当前教育改革与发展方面的研究思路与创新见解。

上述全部史料的编选，基本上涵盖了西方古代、近代和现代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诸如高等教育、普通教育、幼儿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等等。总之，这部《史料选粹》力图比较全面地反映出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给本学科的教学与科研提供一个扎实的史料参考。

《史料选粹》是一部史料书，但它又不是一般的史料汇集和简单排列，而是经过大量的科研工作的成果。这可从几个方面得到体现：

其一，从设计史料选集的体系、对史料的搜集、新译和筛选，对史料的必要的诠释与剖析，整个过程都是在科学研究中进行的，并认真贯彻“古为今用”、“外为中用”的原则，使所选出的史料、资料既与教材的体系尽量吻合，又力图使史料的中心内容能与当前国外教育发展的趋势与潮流有所相应，特别是能对我国当前教育改革的需求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使千百年来重要的史料显示出它们新的生命力，作为一面历史的明镜，为今天的教育发展发射出熠熠的历史光彩，能为当前的教育发展提供切实的启示作用。

其二，前面已提到，在《选粹》中，除选编了教育史发展本

身的原始史料外，还选收了一些各历史时期中有关教育问题进行科研的重要成果。它们包括理论文章、实践经验总结、实验效果的评论等等，这些成果都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上进行的，容或有各种局限，但从外国教育史发展的长河来看，它们又在某种程度上科学地肯定了正确的历史经验和理论论述，也在一定程度上科学地批驳了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教育盲动和谬误主张，这相对地纠正了教育史发展中的错误倾向，使教育发展少走了弯路。因此，这些科研成果在探索教育发展规律、促进教育前进中是很有价值的，它们也应该是选收的重要内容。而这种选收的过程必然离不开科学研究，要在大量的资料面前，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清楚地了解每项历史研究成果的背景，所遇到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发展的条件和发展水平，才能正确地把握这些资料的历史意义，在编选它们时才能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才能在取什么、不取什么方面握有一定的主动权。

其三，在《选粹》中所选的每项史料或资料的具体内容之前，我们都写有一个（说明），内容主要是阐明该项史料的产生背景、所反映的史实、所包含的教育思想内涵和理论价值，及其在教育史发展中的影响地位和对当前教育改革及科研所具有的借鉴价值。所有这些都表明编选者对所选史料的科学性思考与认真钻研的所获。综上，可以说这本史料书具有史料与科学研究的双重价值。

其四，我们在编选与钻研这部长达百余万字的史料文集的全过程中，不但加深了对外教史基本知识的学习，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关于教育问题的许多理论性思考，在提高我们的教育见解、扩展对教育发展规律的深层次认识方面有很大收获。下面仅举一些实例说明我们在这部史料文集的编选与科研过程中所获得的一些新认识。

1. 从教育起源问题看教育的本质

在《史料选粹》中选编了有代表性的西方学者关于教育起源于生物现象和心理摹仿现象的论述，也选编了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下有关教育起源于人类劳动活动的需要和原始人类群体社会生活中最简单的社会关系的需要的文章，以及对当前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一些部落的教育考察资料。西方有关教育起源的论述可以说是以历史唯心主义为认识基础的，而关于教育起源于劳动及社会关系需要的文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起源观更正了前者。

教育起源问题既是一个史实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它涉及到对教育本质的科学认识。把教育起源归结为生物的本能活动或心理的摹仿活动，实际上是从理论上抽掉了教育的社会性的实质；而把教育起源归之于人类最早的劳动活动的需要以及人类原始群体的社会生活及社会关系的需要，则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阐明了教育是人类所独有的活动，而不是一般生物都具有的本能生长活动。同时，教育是人类社会生活所需要、所决定的社会活动，而不是简单的个人活动。教育从一产生就是有意识、有目的、自觉的社会性活动。这就科学地解释了教育活动的物质生活、人际关系、文化观念等基础和基本因素，而否定了教育起源于生物本能需要和简单的心理摹仿的结论。虽然，在人类的教育活动中，人的本性特征以及人的心理活动都具有一定意义，但它们绝非教育活动的根源。正因为教育是人类的社会生活现象，所以，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不断复杂化，教育活动本身也不断复杂化起来，直到阶级社会产生后，教育本身也带上了阶级性。

因此，教育起源既是一个史实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关于史实，在《选粹》中选了有关当代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原始部落的教育资料给以佐证。关于后者，在《选粹》中选编了一些对教育起源问题不同观点进行争论的中、外文章，它们更增加对

教育起源问题的认识是关乎对教育本质的科学认识的深度思考。

2. 对宗教在教育史发展中作用的再认识

从外国教育发展的原始史料中可以充分感觉到，一部外国教育的发展史，无论在哪一时代，哪一国家与地区，其教育的发展都受宗教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欧洲的封建社会中，宗教、教会更成为对教育、学校发展的垄断势力。到了近、现代，文化、科学发展到极高的水平，但在西方国家，宗教在学校教育以及社会的大教育中，仍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宗教之所以对教育发展有巨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逐渐发展成为对人的思想、观念起支配作用的精神塑形工具，因此，宗教活动与人的教育活动在总的目的和形式上极其相似，二者都是要做影响人的工作。所以，宗教在学校一产生便进入学校教育领域，对人的宗教灌输与教育便结合成一个统一的过程。

从奴隶社会开始，原始宗教便随社会历史、社会观念和文明程度的发展也日益发展起来。在全世界范围中，依地域与生活条件的不同，最终形成世界三大宗教派别：公元前6~5世纪创立于东南亚的佛教、公元1~2世纪创成于罗马帝国、后流传至欧、美、大洋洲各国的基督教、以及公元7世纪初创立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这三大宗教都是历史的产物，各有自己的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反映各该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状况和思想要求。但它们在各自传教的国家和地区中，都普遍重视学校教育，把本教派的教义作为学校的教育内容，或把传教场所如寺院、教会、庙宇等直接作为学校的所在地。欧洲的基督教在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时期，成为欧洲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对学校教育的发展更具有垄断的地位。当时的学校被称做“教会的助手”。

宗教控制学校教育以及整个社会的大教育的结果，主要表现为以神学教条充斥于整个的教育、教学过程，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学生实行宗教思想控制的过程。西方学者曾指出，基督教对教育

的垄断，极大地限制了欧洲理智生活的发展。

马克思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的产生固然是由一定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条件形成的，但其本质是对人民思想的麻醉，在漫长的阶级社会中，统治者总是利用宗教宣传来愚昧人民，维护剥削制的巩固，而宗教在教育事业中的渗透，也集中地起了对正常的、按规律应健康前进的教育发展的阻滞作用，加重了教育的保守落后性质。例如：用崇拜神学推行教育过程中的反理性主义、教育内容充斥着以神学为核心的反科学性、极力反对儿童身心自由发展、宣传“身体是灵魂的监狱”等思想观念，导致教育成为对人的身心严酷摧残的过程。这种对教育的普遍的宗教桎梏可说是自阶级社会以后，教育带上阶级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宗教对教育发展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在教育史中表现得非常清楚。

但是，如果从人类教育由低向高、由简陋向复杂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又不能完全无视宗教在人类文化保存、教育发展中的重要的历史作用。三大宗教的文化教育活动，虽以麻痹人民思想、维护教权、巩固反动的政治制度为主要目的，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社会战乱频仍、文明低落、历史文献杂乱散失、人民的文化知识近于荒芜的历史条件下，正是寺院、教会成为保存、搜集、整理、研究，以及交流古代文化遗产和遗存的集中地。随着历史及人类文化的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向前发展，不管东方还是西方，宗教场所都在残存的文化、典籍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适合新时期需要的神学及教义的深入研究与传播，而与之同时，带动了对与哲学、文学、法学及艺术等相关知识的加深认识，甚至医学、科学也从与神学迷信相抵触的意义上得到了发展。这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而由宗教团体所主宰的各种学校教育，不管其形式如何，水平高低，却都在实践中，给普通民众以最低的识字教育、初级的启蒙教育，一直到高级人才的培养和由国际性宗教交流而带来的文化传播等各个方面，都在历史上有不

可磨灭的贡献，而对学校教育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课程的制定、教学用书的编纂、各种教学方法的探讨、教学制度的初步创成等，也大都开始于宗教教育的实践，甚至西方最早的师范教育的发端，也是在教会教育中应需而产生的。总之，从生动的教育发展史料中给人一种启发，即对宗教教育在教育发展史中的作用也应有一个一分为二的认识与分析。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以往那种仅仅批判宗教及其教育在教育发展史中的消极作用，无视它所具有的一定的历史贡献是不恰当、不全面的。19世纪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1824~1870）曾在他写的《学校的三个组成部分》（也译《学校三要素》）一文中，主张创造与发挥学校教育的真正效益在于使学校的行政管理、思想道德教育和各科知识教学三者融合为一，只有使学校的管理工作和学校的教育工作相统一、使知识教学与思想道德教育密切结合，才能产生真正的“教育力量”，而使受教育者得到全面的培养。他在评论曾在法国、英国存在过的耶稣会学校教育时，指出这种教育对儿童个性发展的严酷禁锢、把学生培养成天主教僧团的被动或主动工具的恶劣的教育目的、残酷的、欺骗性的教育手段等等，都表明了这种学校教育的反动实质。但是，耶稣会的学校教育又有它的值得借鉴的一些特点。例如：周密、有效的学校管理、充分的内在思想教导和严格而又巩固的知识教学，这三者的高度结合，会对学生产生一种教育影响的“魔力”，因此，尽管耶稣会学校的教育目的本身是恶劣的、不道德的，但乌申斯基认为，“耶稣会教育的力量成了教育家们注意的一种现象”。因为，学校教育没有“力量”，那就什么教育目的都达不到了。所以，乌申斯基指出，当然不是要把耶稣会学校教育作为“现代教育学的范例”，而是要吸收耶稣会学校由于严格实行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的高度结合而创造的那种“教育力量”。

在英国和法国教育的发展史中，都曾保存和发展过耶稣会学校所具有的那种“教育力量”，法国甚至用以和本国的大学、寄宿

中学教育的极端无能相对比，藉以提高在这些学校中加强“教育力量”的要求，这是重视与吸收宗教教育中积极因素的一个例子。

3. 关于以培养人的个性发展为教育核心目的的历史认识

在西方近、现代教育史上，存在着重视知识传授的“传统教育”和重视人本身的培养与发展的“现代教育”两大体系。“传统教育”把教育对象——儿童看作储存知识的“容器”，教育目的在于通过知识教育，使儿童掌握知识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或者说仅仅是为国家的需要做准备。而“现代教育”则把人的个性自由发展作为教育活动的核心目的，主张全部教育过程应是围绕如何研究、认识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积极培养和发展人本身。这种与传统的只重读书教育不同的教育实践与理论研究，目前已是世界各国和各种社会制度教育发展的主流和普遍的共识了。

重视人的发展的教育属于现代教育的范畴，它是从19世纪末为适应现代工业、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才开始发展并成为现、当代教育发展的大趋势的。然而，一部外教史的发展、演进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在古代、近代前期的教育发展中，主导的教育体系一般说是重视知识传授的，那么，重视对人的培养的教育要求是否也有悠久的历史发展呢？从《史料选粹》中，能明显地看到，重视人本身得到发展的教育理想在遥远的古代教育中即有鲜明的表现，只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包括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社会政治力量的矛盾、历史文化和宗教文化发展的限制与影响，尤其是人本身对自身的培养、教育的规律在这些限制与影响下，还不能很快得到全面的揭示，因此，才使这种重视人本身发展的教育体系，直到19世纪以后，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对自我的地位的自我觉醒迅速发展起来。

在史料中，关于教育应是发展人自己的个性、理性与能力的认识，早在古代教育中就已有一些先知先觉的伟大思想家闪烁出这种思想的火花。例如，古希腊的哲学家“智者”派，就提出过

“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通过教育活动来发展人本身的智慧、理性、才能、美德和辩才，以更好地认识和主宰万物；伟大的希腊哲学家和教育家苏格拉底曾响亮地提出：“认识你自己”的口号，要求人在受教育中追求自己的智慧与思考能力的发展，他的教学方法“产婆术”就是着重于对人自己的思考、彻悟、理解力的启发与发展的最早的方法。而在希腊教育家亚里士多德那里，虽然唯心地把人分为肉体（质料）和灵魂（形式）两个部分，但由此他提出了人是身体与精神不可分割地统一为一体的，所以要通过教育发展人的身体、情感、欲望及高级理性精神，包括智慧、思维、理解能力和判断能力。如果抛掉他的唯心主义思想的外衣，可以看到，他已注意到教育应发展人本身的身心两大方面，从身体，到情感，再到理性判断能力。

但是，这种重视发展人本身的教育理想，在长达千余年的“黑暗年代”的宗教教育禁锢中并没有继续发扬起来，而是被压制、被贬低、被禁止了，代之以对人的束缚与戕害。然而要求培养人本身的教育理想并没有被彻底消灭，反而随时代的前进，积存了人对自己多方面自由发展的渴望，这种情况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便成为一种明确的、强烈的思想要求。在欧洲，从15到17世纪二三百年的·人文主义运动中，随着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政治思想的变化，特别是思想领域中“抑神扬人”的斗争，新世界观、新文化科学的产生与发展，人对自己的地位和主动作用有了新认识。因此，在教育上重视对人本身加以培养的教育观和在教育实践中反抗封建压制和宗教教育的斗争也得到很快的发展，人文主义的教育理论以各种形式反复提出并深刻的论述，重视培养、发展人本身的教育体系以更为鲜明的要求在教育史发展中呈现出来了。

《选粹》以相当多的原始史料明确体现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之后，对通过教育达到人的完善的多方面发展的理想几乎为近代西方教育家的普遍关注所继承与发展。可以说，17

~19 世纪的西方教育观念、教育过程、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等都从神学控制、单纯知识灌输向发展人的能力、个性与思想认识的多方面发展的要求转变，这一时期的许多著名教育家都疾呼以对人的个性、能力的深入研究与对人的自然发展应是教育活动与教育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18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奠基人卢梭在其“自然教育论”中，以其自然教育的理论体系实现了历史上教育思想的大革命，即以研究儿童的本性特点、重视儿童身心的自然发展、把他培养为“人”的教育理想，抨击、批判了封建教育、宗教教育的保守落后。虽然卢梭本人因此受到当时反动势力的极大迫害，但他的教育思想却极大地推动了他以后的以培养人为核心的教育思想的发展。例如：康德提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人类的自然秉赋；裴斯泰洛齐创造性地提出使教育、教学过程心理化，突破了传统教育不顾儿童本身的发展水平，一味实行知识填塞的教育过程和方法；福禄贝尔强调“人”的发展是教育活动的精髓等等。到这里为止，重视人的发展的教育虽然因这一历史时期的读书教育（也是社会发展之必需）的浓重的影响，还没有在各国教育制度的实施中占有最主要的地位，但在外国教育史发展的进程上却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到了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发展，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力、心身全面发展的需要越来越突出了。这些先进的重视人本身发展的教育思想逐步成为现实的教育实践，在一些国家出现了以造就“现代人”为教育目标的“新学校”，也称“新教育”。它很快在欧洲、美国等地扩展成为“新学校运动”，也称“新教育运动”，这种运动是从传统的读书教育向造人教育的大变革，也从此开始了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教育体系牢固树立、迅速发展的开端。

1912 年，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纷纷建立了“新学校”，于是在欧洲建立了“新学校国际联合会”，也译称“新教育联谊社”，其首

任主席是瑞士的社会学家、新教育专家菲利耶尔，他曾写文总结了“新学校”的三十条基本要求与原则，对教育在发展儿童身心两健、增强智力、培养活动能力、扩充广泛兴趣、提高道德思想和审美与艺术能力等方面的具体理想和要求进行了详尽而实际的论述，这对“新教育”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50年，英国教育史专家威廉·鲍义德又发表了《新教育联谊社的基本信仰》一文，概括出了“新教育”的几个理论原则，指出这种教育是“以儿童发展为主的教育”，它的中心目的是尊重儿童的个性，解放儿童的内在精神力量，使儿童的天赋能力与兴趣得到自由发展，并要求在教育过程中注重儿童年龄阶段的特征。同时，为适应当时教育理论对教育的社会作用的普遍重视，还提出必须培养儿童具有献身为社会服务的精神。总之，这篇重要文章综合了“新教育”的特点，这种教育观对人的本质和教育的价值都有全新的认识，它要求“教育必须把儿童和青年人看作是保存、实现、并发展他们的个性的人的一种教育”。“成人在训练学习者时必须让他们尽可能地去思想和行动，不要用成人自己的观点来强制灌输他们。”文章要求，无论是教师还是父母都要与儿童建立正确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灵魂便是利于儿童个性的自由发展。凡成人尊重儿童独立人格的地方，就有“新教育”，“新教育”把儿童当成活生生的、自由发展着的“人”，而不是“物”。鲍义德文章中有关启发、培养、发展人本身的教育理论几乎把自古以来在这方面的教育理想全都概括起来了，并赋予了新时代的内容。它是在“新学校”、“新教育”运动实践、发展近半个世纪之后写出来的，是结合实际经验对“新教育”进行的科学研究的理论成果，把多方面发展人本身的教育理想鲜明、完整、系统地展现出来，有力地影响、推动了20世纪全世界教育的现代化改革，使“新教育”体系中提出的“为现代造人”的口号成为真正的教育现实的发展。